
重磅编译：兰德公司新报告《大国战争的 回归-中美爆发系统性冲突的两种情景》

@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



【作者】蒂莫西·希斯 (Timothy R. Heath)，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克莉丝汀·甘纳斯 (Kristen Gunness)，兰德公司高级政策研究员；戴晟睿 (Tristan Finazzo)，兰德公司研究助理。

【摘要】兰德公司本篇报告在中国已接近全球主导地位的假设条件下，分析了中美间爆发系统性冲突的两种情景（低烈度与高烈度），着重探讨以下四个问题：
①在与美国发生系统性冲突时，中国的国家和安全目标会如何变化？②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将如何运作和现代化其部队？③涉及中美军队的冲突可能在哪里展

开？两军对抗将会如何进行？④中国军队的哪些显著特征可能会促成或阻碍他们对美军的作战行动？

【要词】 中美关系；权力转移；大国竞争；战争情景模拟

【文源】 Timothy R. Heath, Kristen Gunness & Tristan Finazzo,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War: Scenarios of Syste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and Corporation*, August 2022.

【收录】 《大译编参》2022 年第 93 期，总第 238 期，大外交智库（GDYT）外文编译评议组创办。

【编译】 马宇杭，《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纪宁，《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孙海涵，《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就读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鸿儒，《大译编参》外文编译评议员，毕业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审校】 张鸿儒，《大译编参》编辑部执行副主编，毕业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终审】 王盖盖，大外交智库 GDYT 创始人兼院长、《大译编参》编辑部总编、总策划。

编译精选

一、导言

本报告探讨了在中国已接近全球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爆发系统性冲突的情景。为帮助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之间大国战争会如何发展，报告研究

了地缘政治和军事发展趋势、过往大国行为以及国家间冲突模式。根据这些数据，兰德公司研究者提出了中美发生系统性冲突战争的两种情景——一种是低烈度的，另一种是高烈度的。大外交智库 GDYT《大译编参》编辑部英文编译评议员就此对本篇报告进行编译，后面会做一些评述分析，以飨读者。

（一）报告背景：大国竞争升温

冷战结束初，美国一度如日中天。兰德公司该报告开篇指出“如今，从国家实力的各个维度出发进行衡量，美国的战略地位相对于中国等国家均在减弱”。中国被描述为美国“唯一的竞争对手”，可以“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

由于深层次的结构驱动因素，该报告认为中美两国竞争预计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二）报告主体：何为领导大国？

国际关系理论家一直认为，敌对大国之间争夺国际主导地位的斗争往往容易引发系统性冲突。在分析中国如何争夺国际主导地位前，本报告将首先阐明何为全球主导地位（global primacy），以及为何全球主导地位可能引发系统性冲突。

现有对全球主导地位的界定主要有两个流派：霸权稳定论流派与体系领导流派。

霸权稳定论流派将“主导”定义为国家实力远超任一其他国家，对他国实行影响力，即“霸权”；

体系领导流派则与世界体系理论、长周期理论相关，强调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国家在组织和领导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该报告将“领导大国”定义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达到全球卓越水平的国家，该国在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经济体系中均占有主导地位。

（三）报告核心：何为敌对领导大国间的系统性冲突？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霸权稳定论流派与体系领导流派均认为全球领导国在其权力鼎盛时期倾向于施加稳定影响力，权力上升或下降时期往往伴随不稳定和冲突。在该报告的假设情景中，中国尚未取得决定性的全球领先地位，但它已经准备好这样做。

关键假定如下：美国既有能力、也有决心抵制中国取而代之成为全球主导国，因而中美两方均有令人信服的动机诉诸武力以追求或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冲突升级的风险仍然很高。

报告认为“系统性的中美冲突显然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分析它们”。

关键问题包括：在与美国发生系统性冲突时，中国的国家安全目标会如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如何运作其现代化部队？中美两军冲突可能在哪里展开？两军对抗将会如何进行？中国军队的哪些显著特征可能会促成或阻碍对美军的作战行动？

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仍不得而知，但本报告旨在鼓励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考虑。

（四）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报告旨在提供一种知情推测，而非预测，考虑了有关中国未来战争方法的学术发现、国际政治和未来几十年可能持续存在的战争主要趋势，以及过往大国的相关经验，提出了中国军队可能如何在低烈度和高烈度的系统性冲突中作战。

二、地缘政治与军事趋势

分析潜在的中美两国系统性冲突，首先要尽可能描述两国所处的战略环境。本章重点关注关键地缘政治和军事趋势，并考虑这种趋势对中美系统性冲突的潜在影响。

（一）地缘政治趋势

该报告认为以下几个地缘政治趋势预计将持续数十年，并对中美系统性冲突产生重要影响。

1、全球均势的转变

中西方学者均注意到全球权力自西向东的转移趋势，这一趋势为中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提供了根本基础。

2、国际体系日益加剧的分裂与失序

如今，国际体系正在摆脱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这一过程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不确定性。长期存在的安全问题的恶化、各种威胁的扩散以及全球治理机制的薄弱，使得非传统威胁和传统威胁可能相互叠加、恶化。

3、争夺资源和市场

即使中美两国爆发系统性冲突，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仍会持续。中国对安全供应的渴望可能和美国及其盟友的需求发生冲突，从而进一步加剧中美双方的紧张关系。

4、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力不断增强

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实力的衰落，中国在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新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着引领作用。

5、国际伙伴关系的转变

世界正在朝多极化方向转变，地缘政治竞争会变得更加不可预测，国际伙伴关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或消退。

6、区域和全球竞争的风险升高

在本报告的假设情景中，中美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权力平衡和结构差异变化是系统性战争的根本驱动力。

(二) 军事趋势

对战争可能发展的分析可以阐明在中国接近全球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间的冲突可能如何展开。

1、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风险增加

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指持续时间长、手段和目标有限的冲突形式。本报告提到的其他趋势会进一步加剧大国战争风险。

2、社会成为战争的一个领域

战争越来越不仅仅局限于军队。军队与平民之间、以及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行为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3、隐蔽、隐身和代理战争

未来的冲突将更依赖隐蔽和隐身。规模更小、分布更分散、装备更精良的团体降低了发动代理战争的难度。

4、灰色地带行动

灰色地带行动是指主要通过非军事手段实现军事目标或使用胁迫手段实现战争门槛以下的国家目标的行动。这些行动会增加区域不稳定性和因误判而导致冲突升级的风险。

5、网络空间和外太空成为新的竞争领域

未来几十年，中美两国将在上述两个领域展开长期竞争。

6、远程精确制导武器

远程精确打击和多用途平台的发展使各国能够从远处对敌方发动打击。

三、过往的大国行为

中美两国会发生冲突吗？发生什么冲突？冲突发生在哪里？通过间接手段还是常规方式进行？中国军队可能会如何寻求与美国的冲突？报告认为当下还缺乏直接的证据说明，但有一个潜在的数据来源有助于想象这种可能性，那就是过去的那些取得某种形式的国际领导地位的大国经验。以过去主要大国的冲突模式说明潜在的中美冲突关键方面，包括中国可能如何寻求冲突、可能最愿意在哪些地方冒险发动冲突、可能采取哪些类型的冲突。

兰德公司的几位作者从霸权稳定理论和体系领导理论中对中国追求全球首要地位进行了定义，两派观点都认为只有英国和美国曾经达到了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相比之下，前工业时代的主要大国，例如葡萄牙在 15 世纪成功地成为强大

的贸易国，但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也小得多。除去其强大的军事武库、政治影响和庞大的人口，将苏联包括在内可以有助于对中国的分析。

（一）经济诉求

美英两国经济都曾经占比达到世界经济总量 15%，与西方竞争者相比，苏联的经济表现相对较差，从未超过世界 GDP 的 3%。然而，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在东欧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由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其人均 GDP 增长率达到到了最高。与这些历史先例相比，中国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但还没有达到全球第一的地位。报告把 2030 年代末作为中国接近经济霸主地位的假设时期，即假设中国超过了美国经济总体量。

同时，在每个国家的充当经济霸主期间，都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上升期的特点是经济扩张和经济建设能力提高。而中国的这一时期大约是从 1979 年开始的。衰退期意味着全球领先的大国不再拥有世界 GDP 的最大份额或者其份额已然开始了下降。

（二）地理基础

研究帝国的学者注意到每个大国统治都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构成的。对维持一个领先大国最重要的地理区域通常具有密集的贸易、投资、安全和政治关系网络，崛起国往往不会和当下的霸权国拥有相同的势力范围。

报告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全球领导地位的顶峰，但它已经明确表示非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东欧和南欧和 中东是被指定的主要势力范围。非洲的政治影

影响力与对中东等地区的能源依赖是中国做出以上经济援助与合作的重要依据。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往往对美国意义不大。

（三）控制手段

帝国形态理论家朱利安-戈（Julian Go）对两种形式的控制进行了区分。一般来说，非正式控制的力度要比正式控制的力度弱得多。

然而非正式控制对领导大国的成本和风险要小得多。在民族自决是国际社会主基调的背景下，美英两国均选择非正式控制作为其手段。不同的是，苏联方面则一直期望以军事联盟为依托构建所谓的全球帝国。中国依靠的是非正式的控制手段，包括提供财政援助、基础设施投资和各种形式的安全援助，如武器销售、联合国维和部队等。

迄今为止，这些方法只能为中国争取到一定数额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要通过中国吸引力的持久性来论证中国国际力量的可能性，认为对世界经济产业链日益重要的中国终究会赢得国际社会的“被动接纳”。

（四）军事实力

一支能够投射力量的强大军队对于保护重要航道、保卫盟友和阻止对海外国利益的攻击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中国似乎准备向介于西方和苏联之间的方向发展，即期许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却又不主动在海外建立过多的军事基地。截止当下，中国没有在周边之外打过仗，也没有能力在其他大洲维持长时间作战行动。

（五）冲突模式

大国崛起往往都需要一个关键的节点，以真正触发冲突。“系统性战争”“领土掠夺性战争”“军事干预”都为这一节点的到来提供了了机会。然而在双方实力大小未知的不同阶段，各国会倾向于采取不同冲突手段实现自身战略诉求。

对于崛起国而言，考虑到其综合实力往往较弱，因此只会主动发起领土战争，而不会发起系统性战争。系统性战争的发动只可能是受到外部环境刺激而不得已采取的行为。当下来看，中国很有可能诉诸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从长时段来看，中美两国会为了解决系统性的领导权问题而争斗。

四、战略竞争

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其中一方试图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来确保自己的安全。第一类竞争是关于领土和主权的争端；第二类争端涉及特定秩序或体系中的地位、影响和等级问题，被称为位置争端。

战略竞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国家间的敌对行为，它主要涉及位置争端，但也可能涉及自身及盟友的领土争端。兰德公司的研究详细地探讨了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各种因素：威胁感知、问题螺旋、连环危机、联盟建设、军备竞赛、竞争的多边化等。

当下中美两国的发展态势，是以对方为外交斗争对象，关注对方国家的安全漏洞和潜在威胁，并试图寻找在经贸、科技等多领域能替代对方的国家。在敌意、不信任和争吵加剧的气氛中，两国或许将面临发生一次或多次军事危机。鉴于竞争已经从亚太地区升级到全球层面，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周边国家。

关于中美之间的潜在军事冲突，中美学者有以下六点论断：

第一，最初的军事危机可能不是有计划的挑衅。

第二，由于高度的不信任和敌意，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降级可能是困难的。

第三，危机及其难以缓和很可能导致敌对态势的加剧，双方对彼此的威胁感和普遍的敌意会更加强烈。

第四，危机的演化会加速两个国家选择加大军备武装开支的国家发展计划。

第五，中美要克服国内反对将资源从社会需求重新分配到国防需求，可能需要对国内公众舆论进行政治动员，这将会极大程度上提高对对手的威胁感。

第六，尽管当下中国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未来一旦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提升，结盟国家与美国及其盟友出于直接对立状态的话，中美竞争可能演化成集团对立。

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自 2002 年以来一直在概述其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也就是南海归属和台湾问题。在相关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博弈空间都很小，演化出矛盾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看法更多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着眼，即和美国继续竞争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

五、中国军队准备

本章探讨了中国军队的潜在发展，以及它如何为美中之间的重大冲突做好准备。兰德公司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在准备一旦面对与台湾及其他有争议领土有关的突发事件时，随时发动针对美国的战争。但以当下的风险评估，中国决定与美国开战将是一个需要勇气的选择。

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层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在 2049 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报告认为，在中美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中国统治者会继续关注实现“中国梦”，并将其作为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为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兰德公司研究者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做出以下调整：

第一，以现代化经济建设助力军事发展，以便为战争准备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

第二，寻求扩大其海外通道和海外部署军事力量，以更好地保护重要的海外战略利益。这可能是借助联合国促进全球安全机制的调整，也可能是借助现有上合组织等强化海外军事力量。

第三，强化海军的比较实力优势，实现东亚、南亚地区的海上霸主愿景。

第四，调整中国整体作战观念，以主动出击替代过往的防御为主的思路。

最后，动用除极端对立冲突外的一切手段，包括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等打击美国作战合法性。

该报告认为，尽管当下中国不提倡军事同盟，但不代表未来中国不会采取类似的措施以发动局部战争，这可能会是对未来中国军方的最大疑点。

六、中美低烈度冲突场景

本节主要分析中美如何在弱烈度冲突框架下确立全球领导地位。中美弱烈度冲突框架的显著特点是，中美军事力量之间避免冲突升级，包括双方不爆发直接战争、避免核战争、避免在网络空间或外太空发生毁灭性的全面战争。

报告在本章根据地缘政治假定，推测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勾勒出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一）地缘政治假定

当两国进入敌对状态，即两国互相把对方视为“敌对”国家，认为对方有意图和能力威胁自己的基本安全，不管这是否会导致正式宣战，两国都将重新调整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应对冲突。

近年来，中美之间在经济、政治、安全、技术等领域上的竞争和冲突不断升级。

低烈度冲突场景假设：

※在不稳定的局势下，中美间紧张的关系随时可能突破临界点，爆发低烈度的战争。

※随着冲突的发展，中美双方可能会加强各自的国防建设，并加强联盟建设（中国将巩固安全利益伙伴关系）。

※其他国家的介入将增加美中紧张局势的复杂性，可能刺激两国政府利用多边争端为自己谋利，并影响国际社会稳定。

※尽管冲突升级，但出于对核战争的恐惧和贸易上的相互依赖，中美双方不会发生直接战争。

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范式与冷战前几十年类似，当时美苏进行政治动员和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发展联盟，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之间进行代理战争，在世界各地争夺影响力，但两者没有爆发直接的战争。

此时的中美关系就像冷战时美苏关系一样，敌对行动的开始将标志着争夺国际主导权斗争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两国领导人有强烈的动机，根据局势的急剧变化修改战略目标和军事战略。

（二）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

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依然是实现“中国梦”，即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报告认为中国将“战胜美国”作为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兰德公司：“战胜美国”是指，美国国际实力和地位将大大削弱，作为一个美洲地区大国存在，不再能阻碍中国崛起），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具体还包括：

第一，地区主导权方面，中国将建立和维护稳定的周边外交关系，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中发挥更主导的作用，在东亚和东北亚地区施加更大的影响；

第二，经济方面，中国将继续参与安排和领导全球经济活动；

第三，安全方面，受美、日平衡战略影响，中国将继续向全球愿意友好合作的国家寻求支持，尝试建立多边联盟，更妥善地处理周边地区的冲突问题；

第四，在政治上和威望方面，综合实力迅速增长的中国将获得大量的国内和国际支持。

这些国家战略目标将指导解放军执行其针对美国的军事行动。中美间的间接敌对行动刚开始可能伴随着广泛的非军事斗争，因为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和在国际事务上共同参与多边机构，中国目前倾向于通过非军事手段进行国际斗争，尤其是经济、外交和信息领域等的斗争。

（三）中国及其对手的国家利益

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济发展利益和作为大国的信誉和声望。

除本国利益外，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中国还需考虑“附属国”，即在广泛政策问题上支持中国以换取中国保护和利益的国家。中国的“对手”主要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

在低烈度战争场景中，中国领导人可能支持他国攻击对手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会直接与美国支持的国家或地区交战。

（四）中国的军事战略

1、主要威胁

美国将成为中国战略的首要威胁。台湾问题等热点事件可能会成为中美低烈度战争的新前线，并成为中国展示其实力和美国弱点的有效手段。

随着中美间接冲突的爆发，部分国家会通过和美或中结盟来寻求机会；美中双方政府可能介入正在经历分裂的地区或经历国内战争的国家以获得战略优势。

中国在世界各地参与低烈度、间接的战争行动的目的在于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消耗其资源；而一旦美国需要对世界各地的军事介入做出回应，就势必将承受巨大的压力。

与此同时，核扩散、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威胁可能会持续存在，并使局势复杂化。多重威胁以及维护庞大的国内安全机构会给中国增加军事压力，这也是中国不选择与美国爆发直接冲突的原因之一。

2、军事任务和目标

该场景下，中国国家战略的重点主要是通过和平方法实现目标，因此，解放军的军事活动更要承担起通过军事威慑塑造和平环境的责任。

此时，中国军队的任务同时具有延续性和变化性：

第一，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提供支持的基本使命不变；

第二，维护领土和主权的使命可能延伸至指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三，需要加大力度保护中国海外利益；

第四，提供有利安全环境的任务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3、中国军队战力发展

多年来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强烈促使美国和中国加强针对对方的军事建设。即使在低烈度冲突场景中，中国军队可能仍然会专注于在武器和装备的质量上超越美军，以达到威慑目的，并保留升级冲突的选项。中国军队可能在冲突阈值以下部署准军事海上力量和空中支援等能力。

在中美冲突的背景下，两国仍将保持贸易关系，但互相怀有敌意可能对贸易和投资造成相当大的干扰。

报告认为，解放军进行低烈度战争和代理战争时相较于美军仍缺乏经验，对战争误判的风险较大。并且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没有完全克服行政执法薄弱、集中控制的政治偏好、强调政党忠诚、个人统治而非法治以及普遍腐败等问题。

除了军事力量发展，解放军在低烈度冲突中作战的方法还将取决于地理位置、中国威胁感知或利益，以及美国及其代理国所承担的能力等因素。

七、中美高烈度冲突场景

本节探讨了中美之间系统性高烈度冲突的场景，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威胁和紧迫感。在低烈度冲突的情况下，两国可能试图平衡获胜的斗争和达成维持贸易和某种程度的合作，但在本节中两国关系都是敌对和激烈的。低烈度战争升级可能升级为高烈度战争。

（一）地缘政治假定

中美两国竞争在其他国家竞争重叠的趋势下可能会加剧。中美相互动员国际支持的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和全球极化，这反过来可能会增加冲突的风险。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进来时，这将不利于中美在军事化危机中达成妥协，会增加流血和误判的可能性。

此外，世界各地经济混乱的蔓延和未得到解决的安全问题将进一步使两国的军事资源紧张。当中美两国对间接的消耗战失去耐心时，就有可能升级冲突以寻求更快速地结束战争。

（二）中国战时国家战略目标

与美国发生高烈度冲突战争可能会促使中国对其国家战略目标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制定和实施高烈度战争的主要目标将是迅速和决定性地削弱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在中国领导的新秩序中接受一个从属地位。更确切地说，中国将把这场战争视为决定全球领导力地位的一种方式。同样的，这些国家战略目标反过来会框定和指导解放军开展针对美国的行动。

（三）中国战时军事战略

1、主要威胁、军事任务和目标

在高烈度战争的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威胁合作伙伴是最紧迫的优先事项。与美国开战可能意味着与美国在亚洲的关键盟友开战，中国军队可能会需要在多条战线上参与战斗，且主要战斗是发生在中国的外围地区。在应对更紧迫的战争冲突威胁时，非传统危险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对解放军而言，确保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可能仍将是一项优先任务。其他任务重要性可降级。

2、中国军队战力发展：高端系统性战争

不同于在低烈度冲突情况下维护用以展示中国优势和保持政治威望的昂贵高端平台，在高烈度的战争中，中国可能会更愿意冒险以获取决定性的胜利。解放军可能更倾向于寻求用最精锐的部队与美军交战，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采用远程导弹、轰炸机、网络安全手段、潜艇和无人驾驶系统等。

考虑到军事建设的成本，以及随之而来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中美两国在增加国防开支的能力上都将面临严重的限制。但考虑到在高烈度战争的紧迫性，中国可能愿意在短内容忍国防开支的大规模增加以迅速取得胜利。

八、结论

报告认为，中国超越美国获得国际主导地位的前景可能还很遥远，这似乎不太可能，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它是否会发生将取决于地缘政治、经济、人口和许多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其结果超出了该报告的范围。

兰德公司的其他研究表明，中国可能会经历平庸的增长，永远不会有实力颠覆美国的地位。本报告认为这很可能是事实。如果中国逐渐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话，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很难想象一个世界不再保持这种状态。

报告试图探讨，一个敌对的中国已经取得了接近全球主导地位的潜在权力转移对美国的安全可能意味着什么。中美之间权力转移可能是在和平情景之下进行的，然而，报告关注的是这种转移可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苦斗争，并试图提供一些事实和数据，以帮助阐明这种情况可能如何展开。

（一）报告总结

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趋势为某种权力转移的可能性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因。中国和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预计将在未来几年缩小，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名义上远远超过美国，但在人均方面将继续落后于美国。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和西方国家的衰落似乎预兆了一种不稳定的国际秩序，这可能与过去两个世纪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所不同。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可能会导致伙伴关系和联盟关系的转变，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可能会为中国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带来新的机会。如果全球经济朝着亚洲和中国扮演核心角色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机会将进一步扩大。重大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场景可能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军事趋势为了解中美系统性冲突的潜在演变提供了另一个来源。分析人士列出了一些理由，认为战争将变得更加持久，将涉及社会，并与跨国威胁和非传统冲突重叠。先进的军队继续创新，开发新技术和培养军队能力，这些提高了以具

有更高程度的人工智能、无人系统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为特征的中美两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美国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起和管理冲突，特别是中国如何面对主要竞争对手？以往大国的战争和地缘政治控制模式提供了一些可以从中洞察的数据。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建立了一个地缘政治力量基础，中国似乎准备在其关注一带一路地区时这样做。在过去，大国控制其他国家的方式各不相同，最近的趋势是依赖非正式的控制方法，这与中国最近的做法一致。过去大国之间的冲突模式也表明，中国可能倾向于代表附属国进行直接或间接干预，而不是直接侵略、帝国征服和正式吞并领土。

中美敌对行动的开始也可能遵循先前观察到的大国敌对模式。棘手争端的增多、观点的两极分化、威胁观念的加深以及竞争的多国化都可能加剧敌对情绪，进而促使两国领导人视对方为头号威胁。随之而来的是，两国加速军备建设和加强培养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努力。在充满敌意和恐惧的气氛中，任何军事危机升级的风险都可能急剧上升。

本报告第五章研究了解放军修改其对美潜在的现代化作战计划的要素，预计解放军在准备中可能倾向于发展远程弹药和低成本武器，供附属国军队使用。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调动广泛的世界力量，提前向附属国分发武器，并可能依赖民用承包商来增强解放军在世界各地运输部队和装备的能力。

在第六章中，报告综合了前几章的研究结果，构建了美中系统性低烈度冲突的情景。

中美敌对行动倘若发生，即使是以间接的方式，也会使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战争目标可能是逐步削弱美国的力量，使美国

不再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努力构成顽固的威胁。军事行动可以采取行动的形式间接地损害和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同时主张在共同威胁和延续贸易方面进行合作。虽然解放军可能倾向于支持东道国部队，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升级风险，但解放军可能会与附属国军队一起参与作战行动。报告认为，解放军由于有限的远征能力，其最有可能卷入冲突的地区是中国的周边地区。

然而，低烈度冲突可能涉及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对东道国军队的技术支持和军事顾问。美中两国军队非直接接触的环境可以让中国自由地在遥远的美洲附属国部署相当大的军事力量，尽管中国可能倾向于以武器销售和向这些附属国提供军事和技术建议的形式提供间接支持。在中国的周边和最遥远的地区之间，解放军部队可以以有限的方式投射力量，支持在非洲、中东、南亚和南欧的附属国军队的作战行动。内战和国家间战争也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对他们的附属国提供援助。考虑到两国军事力量可能在近距离作战，中美偶尔直接交战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主要以网络空间和信息领域斗争的形式，冲突可能波及每个国家。不过，双方由于担忧网络空间和外层空间失控升级，冲突领域可能会限制在这些领域。一场低烈度战争相对较少的资源投入，可能会引发持续多年的长期战争，尤其是如果两个对手找到了稳定关系的方法，即偶尔就共同的威胁进行合作，即使他们发动间接冲突，也能维持全球贸易。

在第七章中，报告探索了一个高烈度系统性冲突的场景。

那些厌倦了长期、优柔寡断的低烈度战争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被快速、决定性胜利的承诺所吸引，从而通过高烈度战争将冲突升级。这种战争的主要目标是迅速摧毁对手的作战能力，从而使其取胜的机会极为渺茫。常规重大作战行动的出现，在许多方面代表着权力转移战争升级到决定性阶段。敌国造成的伤亡和

破坏不断增加，加剧了风险升级和政治气氛两极分化，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可能难以抗拒。

高烈度的战争可能与世界范围内低烈度冲突的持续或加剧重叠，并以多重敌对关系和对抗为特征。不稳定的全球经济可能使跨国问题恶化，并给可能出现战争的安全环境注入复杂和不稳定的因素。中国军事力量更愿意与美国军队在靠近中国海岸的地方打一场常规战争，可能是在台湾地区或第一岛链的其他爆发点附近，在那里解放军的武器库可以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但随着中国军队的战斗，穿越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脆弱海上航道也可能发生直接交战以保护脆弱的商业交通，并击败美国在这些航线上的潜在威胁。虽然这样的战斗主要由空军和海军部队发动，但中国地面部队可以与空军和海军部队合作，夺取和控制东非和中东的关键咽喉。

（二）报告对美国国防部的若干启示

兰德公司将报告对象直接锁定为美国国防部，并认为该报告对美国的决策者、分析员和规划者有几点启示：

首先，无论是低烈度战争还是高烈度战争，策划者可能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应急措施。

其次，在考虑涉及中国的突发事件时，策划者可能需要考虑一系列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美国应该考虑增强其发动间接战争的能力。

第四，对高烈度战争的分析强调了要确保美国有能力保卫和保护中东和印度洋沿岸的关键咽喉要道。

第五，对于那些考虑到美中长期冲突的潜在情景的美国计划者，他们可能希望关注中国在附属国军队和非常规作战中部署 A2/AD（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可能性。

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应该考虑在台湾等传统热点地区之外，涉及中国的更广泛的可能冲突场景。

虽然讨论的大多数冲突场景都是间接的、低烈度的战斗，但兰德公司的研究者也研究了美国和中国军队在印度洋和中东的冲突。当然，这些仅仅是说明性的例子，而不是预测。但中国决心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这增加冲突发生在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内的可能性。

美国国防部规划人员可能需要考虑与中国的任何冲突场景都将导致在一个广泛的地区和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持续数年)发生一系列冲突的可能性。

本报告概述的中美系统性冲突为双方提供了在世界许多地方进行低烈度战争的强大动机，即使在台湾地区或其他传统爆发点附近进行高烈度战争。

台湾地区附近的常规冲突也可能与印度洋沿岸的高烈度战争同时发生，甚至延伸到东非和中东的关键咽喉地带，还可能扩展到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尽管非传统威胁的挑战可能继续强调交战各方的军事能力。以系统性低烈度冲突为特征的局势也可能延续多年，延续冷战的先例。

美国国防部的规划者和决策者可能希望将更多精力集中在间接冲突上。

低烈度战争造成的相对较小的成本和更有限的破坏使这种形式的冲突更有可能发生，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然而，对美国如何开展此类行动的分析仍处于萌芽状态。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加大以下两方面的研究力度，一是研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二是研究帮助伙伴国抵御由“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支持的威胁的可能性,如此可以扩大抵御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机会,并限制其在欧亚重要经济走廊上维护其主导地位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计划人员应该考虑将确保在中东关键咽喉点的行动与美中可能的作战行动进行结合分析。由于这些咽喉要道对中国确保其印度洋航线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中国可能会有动力指挥主要的作战编队夺取重要运河和海上航线的控制权。围绕这些特征进行常规作战的可能性,对这些地区进行分析以应对主要的中美冲突突发事件。

最后,在第一岛链之外的美中常规冲突场景可能主要包括情报、监视、及侦察传感器和中等规模的远程打击系统单元之间的交战,以及涉及非正规和代理人部队的潜在冲突。想要预测这种情况的计划者可能想要把重点放在有助于获得信息优势的武器和平台上,其中远程攻击可能是最有帮助的。在上述情况下,建立联盟以发展反叛乱和对抗远程打击部队也可能是有用的。

译者评述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判断,可以分为“推断”(infer)、“推测”(speculate)与“预测”(predict)三种形式。三者的区别在于“推断”既要求现有信息和知识,同时也要求具有分析逻辑;“推测”更多是基于不完全信息,个体的主观性影响更大;而“预测”居于二者之间,对支撑证据的要求更高。如果对三者的准确程度进行排序,大体为以下顺序:“推断”>“预测”>“推测”。

本报告是一篇以美国国防部为受众，基于过往大国经验、既有地缘政治和军事趋势、大国冲突模式等内容，对未来中美间可能爆发的系统性冲突进行推测的文章。作者特别强调了文章的“推测”（speculation）而非“预测”（prediction）性质，一方面说明作者有着更大的主观发挥空间，并不保证报告的准确程度；另一方面也间接体现出作者的学术伦理，即“尽可能减轻对现实世界的影响”。

尚若对本文进行深入推敲，可以发现本文确实存在支撑不足的问题。

首先为本文的理论基础。本文基于权力转移理论，将中国视为“崛起国”而美国作为“守成国”，进而认为二者之间会爆发冲突。姑且不论理论本身逻辑是否自洽，报告作者已经自动忽视了中美两国间维持“军事和平”的可能性，显然是有待商榷的。在艾利森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该书作者就对历史大国竞争进行了总结，并发现了维持和平关系的案例。诚然，维持和平关系的具体情景、必要条件等均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先入为主认为中美两国会爆发冲突，显然也不太严谨。而就权力转移理论本身而言，这一理论认为崛起国对向主导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发起挑战，但现实情况是，美国作为主导国，成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其次，为本报告的实证基础。报告作者认为自己进行的推测是“对局势有了了解的”（informed），但无论是诉诸的过往大国经验，还是现有政治军事趋势，更多还是作者自身的主观判断，缺乏数据、一手材料等实证支撑。

此外，本文对中国充满了意识形态偏见。报告中描绘的是一个咄咄逼人、崇拜武力的中国形象，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会自周边地区开始扩张，进而与美国发生冲突。这一假定显然并不贴合中国实际。一方面，中华民族有着“内敛”的基因，不断对外扩张似乎更符合美国的过往经历；另一方面，该报告忽视

了中国内政是中国决策层的首要考虑，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发展自我，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支撑不足叠加意识形态偏见，决定了本报告的参考价值有限。但大外交智库《大译编参》编辑部成员提醒所有读者：报告本身提出的两种烈度冲突情景，以及报告所反映出的美国“由己及人”的战略思维，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毕竟，“自我实现的预言”并非空谈。

问题互动

问题 1、为什么当代美国国际问题智库常发布一些做“未发生事件”的模拟推演以及相关建议报告？这对中国国际问题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有什么启示？

问题 2、如果未来中美之间真的爆发系统性冲突，中国做好了哪些准备工作？新型举国体制下，如何做才能确保中国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平稳实现？

译文拾贝

- 1、Global primacy：全球主导地位
- 2、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霸权稳定论
- 3、System leader：体系领导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 Glory Diplomacy 或 GDYT）是一家创办于 2017 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是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

大外交智库（GDYT）一直坚信“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 2017 年创始初期便开始稳扎稳打，于 2018 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双月刊至今；2019 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并于 2021 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 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中心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 7 月，大外交智库（GDYT）成立外交安全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 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部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中心；2022 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创办《与名人对话》栏目，同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

大外交智库（GDYT）从 2021 年以来至今，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政策分析与思想交流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关青辩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等。

自创办以来，大外交智库（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 2021 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评论员、特约研究员、编译评议员、助理研究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 余人）的青年智库样本标杆，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的的外交与安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实现价值增值与最优，效果非常明显，为政府、企业、智库、高校、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都有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